

目 次

论文

平台企业的灵活积累机制

——一个合约理论的视角 滕 飞(1)

信息逆差:代码权力膨胀与公众权力让渡 施颖婕(21)

大语言模型能用来给主题模型中的主题编码吗?

——兼论大语言模型在社会科学领域应用的前景

..... 李 代 张博伦 周浥莽(33)

数字时代的科技公司与国家治理

——一个综合性的分析框架 钟瑞雪(60)

新闻大数据视角下测度区域一体化水平的新路径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李 军 董方杰(84)

解密数字社会中的幸福密码

——不同互联网使用程度下社会信任感和社会公平感对主观幸福感的

影响机制研究 郭媛媛 张 腾(103)

研究报告

- 数字时代安全科技价值报告 …… 陆菲菲 秦 昊 张友红 吕 鹏(133)
- 问题触发的算法模型响应机制探索 …… 许正军 袁 岳(153)

译文

数字健康的社会技术伦理

——生命伦理学进路的批判和延伸

…… 詹姆斯·肖 约瑟夫·多尼娅 著 何 丽 译(166)

书评

数字资本主义和智能技术的当代批判

——评《过度智能》 …… 周银知(186)

访谈

通过人类行动思考机器智能

——专访人类学家露西·萨奇曼 …… 露西·萨奇曼 胡万亨(198)

CONTENTS

THESIS

The Flexible Accumulation Mechanism of Platform Enterprises: A Contract Theory Perspective	Teng Fei(1)
“Information Deficit”: Code Power Inflation and Public Power Cession ...	Shi Yingjie(21)
Can LLM Label Topics from A Topic Model: The Future of LLM in Social Science	Li Dai, Zhang Bolun, Zhou Yimang(33)
Technology Companies and National Governance in the Digital Age: A Comprehensive Analytical Framework	Zhong Ruixue(60)
A New Approach to Measuring Regional Integ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g Data in News: A Case Study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	Li Jun, Dong Fangjie(84)
Decrypting the Happiness Code in the Digital Society: A Study on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Social Trust and Fairness Perception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under Different Internet Usage Levels	Guo Yuanyuan, Zhang Teng(103)

RESEARCH REPORTS

Report on the Value of Security Technology in the Digital Age	Lu Feifei, Qin Hao, Zhang Youhong, Lyu Peng(133)
Exploration of Algorithmic Model Response Mechanisms for Problem Triggering	Xu Zhengjun, Yuan Yue(153)

TRANSLATED TEXT

The Sociotechnical Ethics of Digital Health: A Critique and Extension of Approaches from

Bioethics written by J. Shaw, J. Donia; trans. by He Li(166)

BOOK REVIEW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Digital Capitalism and Smart Technologies: Review of *Too*

Smart Zhou Yinzhi(186)

INTERVIEW

Thinking Machine Intelligence Through Human Actions: An Interview with Anthropologist

L. Suchman L. Suchman, Hu Wanheng(198)

解密数字社会中的幸福密码

——不同互联网使用程度下社会信任感和社会公平感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研究

郭媛媛 张 腾*

摘要: 尽管已有大量研究探讨了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但关于社会信任感、社会公平感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以及互联网使用程度如何调节这些关系的研究仍相对欠缺。对此,本文将社会信任感、社会公平感和主观幸福感依次设定为自变量、中介变量和因变量。研究对象为不同互联网使用程度的公众,数据来源于2021年中国社会调查数据(CGSS)。通过实证分析,本文有如下发现:首先,互联网使用程度对主观幸福感没有直接影响,受教育程度对主观幸福感呈现显著正向效应;其次,互联网使用程度越高,公众的社会公平感越低,不同省份的公众对社会公平感的感知具有一定差异;再次,性别差异也会影响社会公平感,女性的社会公平感更低;最后,社会信任感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内在机制是前者引起了公众社会公平感的变化。相对于其他群体,有时使用互联网的群体的社会信任感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最强,其社会公平感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最强;从不使用互联网的群体的社会信任感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最强。据此,本文建议持续探究解救“数字难民”的路径,提升公众网络信息素养,建设绿色健康网络环境,提高公众主观幸福感。

关键词: 互联网使用程度 信任感—公平感—幸福感 网络素养

一、引言

主观幸福感被认定为衡量社会保障水平和经济增长结果的关键指标,也是

* 郭媛媛,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张腾(通讯作者:ztdabao@163.com),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国家发展和政策决策的重要目标(罗必良、洪炜杰、耿鹏鹏等,2021)。它不仅是评价国家或地区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准(郭锦墉、王文锋、汤永红,2023),而且与个人心理健康、家庭和谐以及社会稳定密切相关。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提高公众幸福感,并采取了一系列经济社会政策。在经济领域,我国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如“脱贫攻坚战”和“乡村振兴战略”,旨在消除贫困,提升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国务院出台了相关文件,如《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强调数字政府对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和数字生态的引领作用,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在社会保障领域,国务院等相关部门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如《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意见》等,完善了养老、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政策措施。在衣食住行育五大领域,全国医疗保险、保障性住房、全民义务教育等制度保障了公众基本生活条件的满足。然而,值得关注的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尽管经济增长显著,但公众的主观幸福感并未得到相应程度的提升。1990—2022年,我国人均名义GDP增长了52倍,但与此同时公众的幸福感却从7.3分降至5.59分(郭锦墉、王文锋、汤永红,2023)。这种国家经济蓬勃发展与公众主观幸福感下降并存的现象,使我国政府面临一些挑战。

现有关于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分为两方面。首先是个体因素,包括健康状况、个人情绪和受教育程度等。多项研究表明,健康状况和个人情绪直接决定了个人的幸福感受(彭代彦、闫静,2014)。健康状况良好的人通常会有更高的主观幸福感,稳定的个人情绪、良好的受教育程度也是影响人们生活质量和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其次是社会环境因素,如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其中,经济发展水平、收入分配和消费水平等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以及对社会公平、主观幸福的感知(郭锦墉、王文锋、汤永红,2023);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信任感和社会公平感也对主观幸福感产生深远影响。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在互联网普及的时代,互联网使用程度的高低同样可能会影响公众的主观幸福感(丁雨桥,2023)。

尽管已有大量研究关注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但社会信任、社会公平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相互关系仍未得到充分研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其在信息传播、交流方式以及价值观塑造等方面的作用为理解这三者的关系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互联网已经深度融入现代社会,极大地推动了知

识与资源的便利获取。然而,与此同时,网络暴力、虚假信息以及隐私泄露等问题也相应出现,可能削弱社会信任感、社会公平感,进而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因此,如何理解互联网使用程度对社会信任感、社会公平感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调和作用,是一个亟待探讨的问题。尽管互联网在日常生活中的影响日益显著,但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仍相对匮乏。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探究不同互联网使用程度的公众主观幸福感的变化情况,以填补研究空白。本文将尝试回答以下研究问题:社会信任感、社会公平感分别如何影响主观幸福感?它们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逻辑关系?互联网使用程度在社会信任感、社会公平感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怎样的调和作用?通过回答这些研究问题,本文将揭示社会信任感、社会公平感与主观幸福感的内在联系以及互联网使用程度在其中的调和作用,为相关政策制定者提供有益参考。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一) 理论基础

社会资本理论是一种解释社会结构、关系和互动对个人、集体行为影响的理论框架。它强调社会网络、规范和信任等要素在促进社会合作、降低社会成本及提高社会效率方面的重要作用。在本研究框架中,社会信任感被视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通过社会资本理论可以深入分析和解释社会信任感、社会公平感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角度看,社会信任感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可以从多个层面加以理解。一方面,社会信任感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当个体对他人和社会制度具有较高的信任时,他们更倾向于与他人建立联系、参与社会活动并积极投入社会事务。这种积极的社会参与和互动可以提高个体的幸福感,因为它们有助于满足个体对归属、尊重和自尊的需求。同时,信任还可以减轻个体在人际关系、社会交往中的紧张和担忧,从而使他们更容易体验到愉悦和幸福。另一方面,社会信任感还可以通过影响社会公平感来间接地影响主观幸福感。在社会资本理论中,信任被认为是一种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促进资源配置和实现社会目标的重要资源。当社会中

普遍存在较高的信任感时,人们更愿意遵守规则和法律,相信他人和制度能够确保公平地分配和对待。这种信任有助于提高个体对社会公平的感知,从而影响到他们的幸福感。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公平感作为中介变量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社会资本理论还强调了社会网络和规范在构建和维护信任中的关键作用。在本研究框架中,这一观点为分析社会信任感、社会公平感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具体来说,社会网络可以为个体提供信息、资源和支持,从而降低信任风险和成本,促进信任的形成和维持。

公平过程理论的核心观点在于,在对待公平问题上,人们不仅关注结果是否公平,还关注实现这一结果的过程是否公平。许多情况下,过程甚至比结果本身更重要。公平过程可带来积极的心理和社会效应,如提高人们的信任感、满意度和积极参与度。社会信任感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发挥关键作用,因为它有助于确保公平过程的实现。高度的社会信任感意味着人们相信他人和制度会遵循公平的原则行事,这种信任感可以降低人们的防备心理,使他们更愿意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并遵守社会规则。在公平过程理论中,社会公平感与主观幸福感密切相关。提高社会公平感往往会导致主观幸福感的提高,因为公平感让人们觉得权益受到保障、付出得到回报。在一个公平的社会中,人们更可能感受到尊重、认同和满足,从而提高幸福感。

综上所述,本研究框架结合了社会资本理论和公平过程理论,探讨了社会信任感、社会公平感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通过这一理论框架,研究者可以更好地理解社会信任感如何通过社会公平感影响主观幸福感,为相关政策制定者提供有益借鉴。

(二) 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是一个多维概念,包括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等维度(Diener, Suh & Lucas et al., 1999)。主观幸福感指个体对自己生活满意度的主观评价,涉及社会关系、权利和福利等方面;心理幸福感关注个体的心理健康、情绪平衡和自我实现等方面。衡量主观幸福感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单项和多项。单项衡量方法通常使用一个简单的问题来评估个体的生活满意度(Cantril, 1965);多项衡量方法则包括多个方面的问题,如主观幸福感量表(Diener, Emmons &

Larsen et al., 1985)、心理幸福感量表(Ryff, 1989)等。

众多研究揭示了主观幸福感与多种因素的关联,如个人特质(如性格、自尊等)(Diener, Suh & Lucas et al., 1999)、经济因素(如收入水平、经济增长等)(Easterlin, 1974)、社会因素(如社会关系、社会支持等)(Helliwell & Putnam, 2004)、心理因素(如心理健康、情绪调节等)(Lyubomirsky, King & Diener, 2005)等,都与主观幸福感密切相关。此外,健康状况(Dolan, Peasgood & White, 2008)、受教育水平(Oreopoulos & Salvanes, 2011; Blanchflower & Oswald, 2004)等也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良好的健康状况有助于提高个体的生活质量和满意度,也可能影响个体的心理和社会功能;较高的教育水平可能提高个体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和职业满意度,进而提升主观幸福感。学者们还关注到社会信任感、社会公平感对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影响(Uslander, 2002; Alesina, Di Tella & MacCulloch, 2004)。社会信任感体现为个体对他人及社会制度的信任程度。研究发现,社会信任感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Uslander, 2002)。信任有助于个体建立稳固的社会联系,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并降低心理压力和焦虑,因为个体相信他人会遵守社会规范,不会损害自身利益(Putnam, 2000)。社会公平感指个体对社会分配和社会制度公平性的评价。研究表明,社会公平感对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影响(Alesina, Di Tella & MacCulloch, 2004)。当个体感知到社会公平时,他们更有可能认为自己的努力会得到应有的回报,从而激发积极的心态和行为。此外,社会公平感还与社会凝聚力、社会稳定密切相关,这些因素也对主观幸福感具有积极作用(Wilkinson & Pickett, 2009)。

(三) 社会信任感

社会信任感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现象,涉及心理、文化、社会 and 制度等多个方面。目前,学界对社会信任的本质存在较大分歧,大多是从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化论等不同视角出发的观点解释。简而言之,社会心理学路径限于认知、情感和意向的预期,而社会学路径则从制度和社会变迁的角度研究态度以及态度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根据文化论观点,社会信任感是建立在习俗、传统和宗教基础上的文化现象(井世洁、杨宜音,2013)。

大量社会科学文献支持社会信任感对社会公平感的直接正向影响。比如, 乌斯兰纳(E. Uslaner)提出, 社会信任源于人们相信他人通常会做出公正的行为。他发现, 高水平的社会信任感可以增强社区成员对社会公平感的认知, 因为他们相信他人会公正地行事(Uslaner, 2002)。罗思坦(B. Rothstein)等人的研究表明, 社会信任感和社会公平感的关系是双向的。社会信任感不仅增加了社会公平感, 公平的制度和政策也能够增强社会信任感(Rothstein & Stolle, 2008)。这表明, 社会公平感和社会信任感之间存在正向循环关系。此外, 纳伊夫(M. Naef)等人的研究发现, 在面对经济困境时, 社会信任感在促进社会公平感方面起着核心作用(Naef & Schupp, 2009)。他们发现, 在资源相对有限时, 社会信任感对增强社会公平感尤为重要。然而, 并非所有研究结果都完全一致。例如, 桑德斯科(K. Sønderskov)指出, 在高度分化的社会中, 社会信任感并不总是导致社会公平感(Sønderskov, 2011)。然而, 他的研究也表明, 大多数情况下社会信任感确实可以增强社会公平感。井世洁等人认为, 中国公众的社会信任感主要由政府信任感、社会组织信任感和社会信息信任感三方面构成, 存在基于阶层和区域的结构性的差异化特征(井世洁、杨宜音, 2013)。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做出如下假设:

H1: 社会信任感对社会公平感具有直接正向影响。

主观幸福感也被称为“生活满意度”(彭代彦、闫静, 2014), 社会信任感是影响个人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之一, 众多社会科学研究结果都支持这一结论。对世界价值观调查(WVS)中国部分数据的研究发现, 相较于那些认为大多数人不可信且需特别小心谨慎的人, 认为大多数人可以信赖的人报告的生活满意度较高(3.3%), 而生活不满意的概率较低(0.9%)。赫利韦尔(J. Helliwell)等人的研究发现, 社会信任感是主观幸福感的一个重要预测因子(Helliwell & Wang, 2011)。他们收集了34个国家的大量数据, 得出结论: 高水平的社会信任感会增强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此外, 比约恩斯科夫(C. Bjørnskov)的研究提出, 社会信任感不仅能提高人们的幸福感, 还能提高整个社会的幸福水平(Bjørnskov, 2008)。这是因为社会信任感能够减少社会冲突, 促进人们的合作, 创造更和谐的社会环境。郭锦墉等人指出, 消费不平等通过降低人际信任和未来信心抑制了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郭锦墉、王文锋、汤永红, 2023)。哈德逊(J. Hud-

son)的研究表明,社会信任感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社会经济状况和政府效能(Hudson, 2006)。因此,社会信任感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可能因不同的社会环境而异。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做出如下假设:

H2:社会信任感对主观幸福感具有直接正向影响。

(四) 社会公平感

早期研究发现,社会公平感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Alesina, Di Tella & MacCulloch, 2004)。学者们对多个国家的比较研究发现,社会公平感较高的国家其居民普遍具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感(Bjørnskov, Dreher & Fischer, 2007)。这可以从几个方面加以解释。

社会公平感对个体心理的影响至关重要。在公平的社会环境中,个体感受到自己的权益得到尊重,社会资源分配相对均衡,这使得个体的基本需求、价值追求更容易得到满足,从而提高主观幸福感(Brockner, Chen & Mannix et al., 2003);相反,当个体感知到社会不公,他们可能对未来抱有悲观情绪,担忧自身利益受损,从而导致主观幸福感降低(Rawls, 1971)。在公平的社会环境中,个体更容易建立互相信任的社会关系,形成更为稳固的社会支持网络(Wilkinson & Pickett, 2009)。这种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因为它能帮助个体应对压力,提高心理适应能力(Cohen & Wills, 1985)。此外,社会公平感还与政治参与、公民责任感相关。在公平的社会环境中,个体更有可能参与社会活动、履行公民责任,这些行为对个体的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Putnam, 2000);相反,在不公平的社会环境中,个体可能会感到愤怒和失望,产生消极的社会行为,从而降低主观幸福感(Gurr, 1970)。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社会公平感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这种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因为它能帮助个体应对压力,提高心理适应能力(Cohen & Wills, 1985)。此外,社会公平感还与政治参与和公民责任感相关。在公平的社会环境中,个体更有可能参与社会活动,履行公民责任,这些行为对个体的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Putnam, 2000)。相反,在不公平的社会环境中,个体可能会感到愤怒和失望,产生消极的社会行为,如罢工、抗议等,从而降低主观幸福感(Gurr, 1970)。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做出如下假设:

H3:社会公平感对主观幸福感具有直接正向影响。

(五) 互联网使用程度

互联网使用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国外部分学者从社会学、心理学角度展开了相关研究。目前,研究中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即互联网信息抑郁论和互联网信息动员论。互联网信息抑郁论认为,面对海量信息时,个体容易产生心理压力和不适感,这种现象在数字时代尤为明显。互联网、社交媒体和其他数字平台上的信息爆炸式增长导致信息过载,使人们容易产生思维混乱、注意力分散、抑郁等问题,从而影响主观幸福感。同时,过度使用社交媒体可能导致焦虑、自卑感,与他人的“完美”生活进行比较使个体感到不满足和沮丧,进一步降低主观幸福感。在大量信息面前,人们的注意力难以集中,决策疲劳也会随之产生。此外,过度依赖网络寻求心理慰藉可能导致网络成瘾,影响日常生活和社交功能,进一步削弱主观幸福感(Robinson, 1976)。其中,互联网时间替代假说认为,过度使用互联网可能导致社会互动和交往时间的减少,进而影响主观幸福感。由于人际关系是主观幸福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其负面影响将对主观幸福感产生不良后果。

互联网信息动员论与互联网抑郁论相反,认为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在不同使用场景下可以促进人际互动和联系,从而产生积极影响,提升公众主观幸福感。网络平台使人们能便捷地与他人建立联系,跨越地域和文化障碍实现全球信息共享。互联网的发展未必导致现实生活中社会互动的减少,反而可以帮助人们协作、组织活动和分享经验。

丁雨桥发现,中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频率越高,使用的工具越多元、用途越广泛,他们对生活的满意度也相对越高,这说明互联网的使用对于提高中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丁雨桥,2022)。此外,研究表明,中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程度越高、家庭情况越好、身体越健康,对提高他们的主观幸福感越有利。有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可以增强社区的社会联系,从而提高社会信任感。这可能是因为互联网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和交流平台,使人们能够更容易地获取信息、分享经验、建立和维持社交关系。

根据 CGSS 2021 问卷原文,本文将互联网使用程度划分为五种类型,而本

文主要研究“从不使用”“有时使用”和“频繁使用”这三种类型。通过对比这三类互联网使用者,研究人员可以揭示互联网使用对现实生活中社会互动和主观幸福感的具体影响。此外,这种分类也有助于验证互联网时间替代假说和互联网信息动员论的适用性,并进一步探讨如何在网络与现实世界中找到平衡。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做出如下假设:

H4:频繁使用互联网的群体,其社会信任感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相对其他群体更显著。

H5:频繁使用互联网的群体,其社会信任感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相对其他群体更显著。

（六）理论框架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构建如下理论框架(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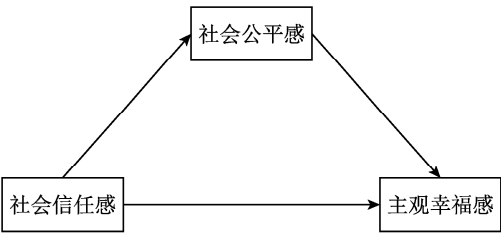


图1 信任—公平—幸福三因素模型

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 2021 的数据,为确保数据质量和准确性,进行了数据清洗和整理。在处理数据时,删除了缺失值样本,以提高分析结果的可靠性。通过对数据的严谨处理,本文旨在更准确地探讨在不同互联网使用程度下,社会信任感和社会公平感如何影响主观幸福感,为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各界提供有针对性的建议,以提高公众主观幸福感。

(二) 受访者基本情况

受访者基本情况如表 1：

表 1		受访者基本情况			
指标		数量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性别	男	2452	45. 8	45. 8	45. 8
	女	2903	54. 2	54. 2	100. 0
	总计	5355	100. 0	100. 0	
民族	汉族	4955	92. 5	92. 5	92. 5
	蒙古族	10	0. 2	0. 2	92. 7
	满族	22	0. 4	0. 4	93. 1
	回族	119	2. 2	2. 2	95. 4
	藏族	4	0. 1	0. 1	95. 4
	壮族	100	1. 9	1. 9	97. 3
	维吾尔族	145	2. 7	2. 7	100. 0
	总计	5355	100. 0	100. 0	
宗教信仰	无宗教信仰	4952	92. 5	92. 5	92. 5
	佛教	180	3. 4	3. 4	95. 8
	道教	15	0. 3	0. 3	96. 1
	民间信仰	17	0. 3	0. 3	96. 4
	伊斯兰教	102	1. 9	1. 9	98. 3
	天主教	11	0. 2	0. 2	98. 5
	基督教	73	1. 4	1. 4	99. 9
	其他	5	0. 1	0. 1	100. 0
	总计	5355	100. 0	100. 0	
受教育程度	没受过任何教育	559	10. 4	10. 4	10. 4
	扫盲班	28	0. 5	0. 5	11. 0
	小学	1174	21. 9	21. 9	32. 9
	初中	1509	28. 2	28. 2	61. 1
	职业高中	89	1. 7	1. 7	62. 7

(续表)

指标		数量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受教育程度	普通高中	628	11.7	11.7	74.5
	中专	238	4.4	4.4	78.9
	技校	21	0.4	0.4	79.3
	大学专科(成人高等教育)	175	3.3	3.3	82.6
	大学专科(正规高等教育)	246	4.6	4.6	87.2
	大学本科(成人高等教育)	135	2.5	2.5	89.7
	大学本科(正规高等教育)	478	8.9	8.9	98.6
	研究生及以上	75	1.4	1.4	100.0
	总计	5355	100.0	100.0	
地区	安徽省	290	5.4	5.4	5.4
	北京市	434	8.1	8.1	13.5
	福建省	213	4.0	4.0	17.5
	甘肃省	193	3.6	3.6	21.1
	广西壮族自治区	266	5.0	5.0	26.1
	河北省	205	3.8	3.8	29.9
	河南省	284	5.3	5.3	35.2
	湖北省	387	7.2	7.2	42.4
	湖南省	324	6.1	6.1	48.5
	江苏省	338	6.3	6.3	54.8
	江西省	333	6.2	6.2	61.0
	辽宁省	232	4.3	4.3	65.3
	内蒙古自治区	64	1.2	1.2	66.5
	宁夏回族自治区	73	1.4	1.4	67.9
	山东省	390	7.3	7.3	75.2
	山西省	203	3.8	3.8	79.0
	陕西省	251	4.7	4.7	83.7
	浙江省	312	5.8	5.8	89.5
	重庆市	563	10.5	10.5	100.0
	总计	5355	100.0	100.0	

从表 1 可知,就受访者性别而言,女性(54.2%)的比例略高于男性(45.8%)。在民族构成上,汉族占总人数的 92.5%,维吾尔族和壮族分别占 2.7%和 1.9%。关于宗教信仰,无宗教信仰者占多数,比例为 92.5%,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信徒分别占 3.4%、1.4%和 1.9%。在受教育程度分布上,61.1%的人具有初中及以下的教育水平,而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人占总人数的 10.3%。在地域分布方面,重庆市的占比最高(10.5%),其次是北京市(8.1%)和山东省(7.3%)。

(三) 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 2:

表 2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指标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偏度		峰度	
					统计	标准误差	统计	标准误差
互联网使用程度	1	5	3.33	1.670	-0.414	0.033	-1.520	0.067
社会公平感	1	5	3.67	0.993	-0.855	0.033	0.187	0.067
社会信任感	1	5	3.46	0.975	-0.769	0.033	-0.001	0.067
公众幸福感	1	5	3.99	0.819	-1.064	0.033	1.817	0.067

本文使用 SPSS 23.0 统计软件计算了 4 个观察变量的最小值、最大值、平均值、标准差、偏度和峰度。从最小值和最大值来看,所有观察变量的最小值和最大值都在合理取值范围内。平均值反映了一般水平,标准差反映了样本之间的差异程度。通过描述性统计可以发现,数据中没有异常值。一般用偏度和峰度来验证数据的正态分布:当数据服从绝对正态分布时,偏度和峰度都等于 0;但一般数据很难严格满足正态性条件,如果峰度绝对值小于 10 并且偏度绝对值小于 3,则说明数据虽然不是绝对正态,但可接受为近似正态分布。从表 2 可知:本样本峰度的绝对值全部小于 10,最大绝对值为 1.817;偏度的绝对值全部小于 3,最大绝对值为 1.064。该结果表明,数据可接受为近似正态分布。

四、结果与讨论

本文将应用场景分为三个群体;第一个场景是从不使用互联网的群体,即在 5 级李克特量表中选择选项 1 的公众;第二个场景是中等程度使用互联网(有时使用互联网)的群体,即在 5 级李克特量表中选择选项 3 的公众;第三个场景是频繁使用互联网的群体,即在 5 级李克特量表中选择选项 5 的公众。

(一) 二元 Logit 回归分析

1. 对主观幸福感的二元 Logit 回归分析

将 Provinces(省份)、Min(民族)、Educ(受教育程度)、Gender(性别)、Income(收入)、Religion(宗教)、IUD(互联网使用程度)作为自变量,将主观幸福感(SW)作为因变量,进行二元 Logit 回归分析(表 3、表 4)。

表 3 二元 Logit 回归模型似然比检验结果						
模型	-2 倍对数似然值	卡方值	df	p	AIC 值	BIC 值
截距	1021.595					
最终模型	1001.999	19.596	7	0.007	1017.999	1057.066

从表 3 可知,此处模型检验的原定假设为:是否放入自变量(Provinces、Min、Educ、Gender、Income、Religion、IUD)两种情况时模型质量均一样; $p<0.05$,拒绝原假设,说明本次构建模型时放入的自变量具有有效性,本次模型构建有意义。

表 4 二元 Logit 回归分析结果汇总							
项	回归系数	标准误	z 值	Wald χ^2	p 值	OR 值	OR 值 95% CI
Provinces	-0.026	0.016	-1.631	2.662	0.103	0.974	0.943—1.005
Min	-0.096	0.044	-2.189	4.794	0.029	0.909	0.834—0.990
Educ	0.062	0.030	2.048	4.195	0.041	1.064	1.003—1.129
Gender	-0.022	0.181	-0.123	0.015	0.902	0.978	0.686—1.395
Income	0.002	0.001	1.520	2.310	0.129	1.002	0.999—1.004

(续表)

项	回归系数	标准误	z 值	Wald χ^2	p 值	OR 值	OR 值 95% CI
Religion	-0.006	0.022	-0.268	0.072	0.789	0.994	0.952—1.038
IUD	0.117	0.184	0.638	0.407	0.523	1.124	0.784—1.612
截距	1.399	0.418	3.345	11.192	0.001	4.049	1.785—9.187
因变量:SW	McFadden R ² :0.019		Cox & Snell R ² :0.020		Nagelkerke R ² :0.031		

从表 4 可知,Provinces、Min、Educ、Gender、Income、Religion、IUD 可以解释 SW 的 0.02 变化原因。模型公式为:

$$\ln(p/1-p)=1.399-0.026 * Provinces-0.096 * Min+0.062 * Educ-0.022 * Gender+0.002 * Income-0.006 * Religion+0.117 * IUD$$

其中 p 代表 SW 为 1 的概率, $1-p$ 代表 SW 为 0 的概率。

受教育程度对主观幸福感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这可能源于教育为个体带来的多维度积极效应。具体而言,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可能提升个体的数字信息接入、获取和利用能力,提高社会经济地位,扩大职业机会,从而促进其生活质量的提升,进一步促成更高的主观幸福感($z=2.048, p<0.05$)。教育还可能提高个体的问题解决能力和抗压技巧,这些均为提升主观幸福感的重要驱动力。另外,研究结果显示,省份、性别、收入、地区以及互联网使用程度等因素对 SW 并无显著影响。

2. 对社会公平感的二元 Logit 回归分析

将 Provinces、Min、Educ、Gender、Income、Religion、IUD 作为自变量,将 SF (社会公平感)作为因变量,进行二元 Logit 回归分析(表 5、表 6)。

表 5 二元 Logit 回归模型似然比检验结果

模型	-2 倍对数似然值	卡方值	df	p	AIC 值	BIC 值
截距	1331.700					
最终模型	1300.949	30.750	7	0.000	1316.949	1356.017

从表 5 可知,此处模型检验的原定假设为:是否放入自变量(Provinces、Min、Educ、Gender、Income、Religion、IUD)两种情况时模型质量均一样; $p<0.05$,拒绝原假设,说明本次构建模型时放入的自变量具有有效性,本次模型构建有

意义。

表 6 二元 Logit 回归分析结果汇总

项	回归系数	标准误	z 值	Wald χ^2	p 值	OR 值	OR 值 95% CI
Provinces	-0.048	0.014	-3.551	12.607	0.000	0.953	0.928—0.979
Min	-0.019	0.041	-0.470	0.221	0.639	0.981	0.905—1.063
Educ	0.002	0.023	0.101	0.010	0.920	1.002	0.958—1.049
Gender	-0.415	0.152	-2.728	7.442	0.006	0.660	0.490—0.890
Income	0.001	0.001	1.392	1.937	0.164	1.001	1.000—1.003
Religion	-0.004	0.019	-0.189	0.036	0.850	0.996	0.960—1.034
IUD	-0.367	0.159	-2.303	5.305	0.021	0.693	0.507—0.947
截距	1.788	0.358	4.993	24.927	0.000	5.975	2.962—12.053
因变量:SF		McFadden R^2 :0.023		Cox & Snell R^2 :0.031		Nagelkerke R^2 :0.042	

将 Provinces、Min、Educ、Gender、Income、Religion、IUD 作为自变量,将 SF 作为因变量进行二元 Logit 回归分析。从表 6 可以看出,Provinces、Min、Educ、Gender、Income、Religion、IUD 可以解释 SF 的 0.02 变化原因。模型公式为:

$$\ln(p/1-p)=1.788-0.048 * Provinces-0.019 * Min+0.002 * Educ-0.415 * Gender+0.001 * Income-0.004 * Religion-0.367 * IUD$$

其中 p 代表 SF 为 1 的概率, $1-p$ 代表 SF 为 0 的概率。

Provinces($z=-3.551, p<0.001$)、Gender($z=-2.728, p<0.01$)、IUD($z=-2.303, p<0.05$)会对 SF 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但是 Min、Educ、Income、Religion 并不会对 SF 产生影响关系。也即,该结果具有三个结论。一是互联网使用程度越高,公众的社会公平感越低。互联网的普及和使用给人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信息获取途径,丰富的信息量反之又可以提升个体对社会公平的认知,形成反馈循环(feedback loop)。然而,该过程可能带来不确定的影响。频繁使用互联网的人群的社会公平感较低,这可能是因为信息爆炸时代社会不公平的事件传播速度更快,从而扭曲了个体对社会公平的总体评估。二是不同地区的公众对社会公平感的感知具有一定差异,地域差异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经济、文化和政治背景,这些元素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居民的价值观

和期望,从而影响了他们对社会公平的感知。三是性别差异会影响社会公平感,女性的社会公平感更低。社会角色理论(social role theory)认为,男性和女性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可能对他们的期望和认知产生影响。

(二) 不同互联网使用程度的中介效应分析

1. 从不使用互联网

从不使用互联网群体的分析结果见表 7。

从表 7 可知,中介效应分析共涉及三个模型,分别如下:

$$A36=3.439-0.033 * Provinces-0.117 * Gender-0.026 * Min-0.001 * Religion+0.012 * Educ+0.001 * Income+0.254 * A33$$

$$A35=3.070-0.019 * Provinces-0.197 * Gender-0.003 * Min-0.019 * Religion-0.008 * Educ+0.001 * Income+0.282 * A33$$

$$A36=2.364-0.026 * Provinces-0.048 * Gender-0.025 * Min+0.006 * Religion+0.015 * Educ+0.000 * Income+0.155 * A33+0.350 * A35$$

社会信任感(A33)显著正向影响社会公平感(A35)($\beta=0.282,p<0.01$),表明从不使用互联网的群体其社会信任感越高,社会公平感也越高,H1 成立。这一发现支持了英格哈特(R. Inglehart)的观点,他指出社会信任感是一个重要的心理和社会资源,有助于增强个体对社会公平性的认同(Inglehart, 1997)。当个体在社会中感受到信任时,他们更容易相信社会制度是公平的,从而提高幸福感。相较于互联网用户,非互联网用户接触的信息量相对有限,这可能导致他们的社会公平感评估受到较少的消极信息影响。互联网上充斥着各种关于社会不公平的报道,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互联网用户对社会公平性的评价;相比之下,非互联网用户可能对社会公平性持有更积极的观念。此外,非互联网用户可能更倾向于在现实生活中建立和维护社会联系。这种人际交往的亲密度和频率可能会加强社区的凝聚力,并形成更强的社会信任感。同时,这种紧密的社区环境也可能促进公平的社会规则和习俗的形成,从而提高社区成员对社会公平感的评估。

社会信任感(A33)和社会公平感(A35)均显著正向影响主观幸福感(A36)(分别为 $\beta=0.155,p<0.01;\beta=0.350,p<0.01$)。这意味着在从不使用互联网的

表 7

中介作用分析结果

N = 339

	A36					A35					A36				
	B	标准误	t	p	β	B	标准误	t	p	β	B	标准误	t	p	β
常数	3.439**	0.358	9.598	0.000	—	3.070**	0.392	7.833	0.000	—	2.364**	0.361	6.552	0.000	—
Provinces	-0.033**	0.011	-2.990	0.003	-0.156	-0.019	0.012	-1.550	0.122	-0.081	-0.026*	0.010	-2.581	0.010	-0.125
Gender	-0.117	0.122	-0.957	0.339	-0.052	-0.197	0.133	-1.479	0.140	-0.080	-0.048	0.113	-0.421	0.674	-0.021
Min	-0.026	0.027	-0.942	0.347	-0.049	-0.003	0.030	-0.089	0.929	-0.005	-0.025	0.025	-0.981	0.327	-0.047
Religion	-0.001	0.014	-0.072	0.943	-0.004	-0.019	0.015	-1.245	0.214	-0.065	0.006	0.013	0.436	0.663	0.021
Educ	0.012	0.038	0.314	0.754	0.017	-0.008	0.041	-0.195	0.846	-0.011	0.015	0.035	0.420	0.675	0.021
Income	0.001	0.000	1.545	0.123	0.081	0.001	0.000	1.816	0.070	0.095	0.000	0.000	0.914	0.361	0.044
A33	0.254**	0.050	5.075	0.000	0.265	0.282**	0.055	5.166	0.000	0.271	0.155**	0.048	3.221	0.001	0.162
A35											0.350**	0.046	7.526	0.000	0.380
R ²			0.120					0.109					0.249		
调整 R ²			0.101					0.090					0.231		
F 值				F(7331) = 6.444, p = 0.000											F(8330) = 13.667, p = 0.000

注：* p<0.05, ** p<0.01。下同。

群体中,社会信任感和社会公平感越高,主观幸福感也越高,H2、H3 成立。这一结果与乌斯兰纳的观点相符,即社会信任感、社会公平感是主观幸福感的关键决定因素(Uslaner, 2002)。此结果也与普特南(R. Putnam)的研究结果一致,他认为社会资本的积累对提高主观幸福感具有积极作用(Putnam, 2000)。卡瓦奇(I. Kawachi)等人也认为,社会信任感、社会公平感可以提高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从而提高主观幸福感(Kawachi, Kennedy & Lochner et al., 1997)。社会信任感可以降低心理压力,减少担忧和恐惧,增强个体对未来的乐观预期;社会公平感可以满足个体对公平和正义的需求,降低社会不满和抱怨,从而提高主观幸福感。进一步而言,社会资本理论阐述了社会信任感、社会公平感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和谐稳定产生积极影响,从而间接提升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感受到社会公正待遇的个体,会增强对社会的认同和归属感,降低心理压力,从而提升幸福感。此外,社会公平感、社会信任感可能通过其他机制影响主观幸福感。例如,高水平的社会信任感可以促进社会合作,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提高社会效率;强烈的社会公平感能降低社会矛盾和冲突,提高社会稳定性;两者都可能通过提升社会和个体的福利水平来提高主观幸福感。

从调整后的决定系数(R^2)来看,模型 3 的解释力最强(0.231),表明主观幸福感(A36)受到社会信任感(A33)、社会公平感(A35)以及其他控制变量的综合影响。

表 8 中介作用检验结果汇总										
项	c	a	b	a * b	a * b	a * b	a * b	a * b	c'	检验结论
	总效应			中介效应值	Boot SE	z 值	p 值	95% Boot CI	直接效应	
A33→A35→A36	0.254 **	0.282 **	0.350 **	0.099	0.030	3.241	0.001	0.052—0.170	0.155 **	部分中介

表 9 中介作用效应量结果汇总						
项	检验结论	c	a * b	c'	效应占比计算公式	效应占比
		总效应	中介效应	直接效应		
A33→A35→A36	部分中介	0.254	0.099	0.155	a * b/c	38.958

在表 7 中, A33(社会信任感)对 A35(社会公平感)的影响(a 路径)以及 A35 对 A36(主观幸福感)的影响(b 路径)均为显著;同时,社会信任感(A33)通过社会公平感(A35)对主观幸福感(A36)的间接效应(a * b 路径)也非常显著(表 8、表 9)。这表明,社会公平感(A35)在社会信任感(A33)与主观幸福感(A36)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此结论与普特南、乌斯兰纳的研究观点相符。在表 9 中,社会信任感(A33)通过社会公平感(A35)对主观幸福感(A36)的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38.958%,这意味着 A35(社会公平感)在 A33(社会信任感)与 A36(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证实了卡瓦奇、英格哈特的观点。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信任感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的内在机制,是通过引起社会公平感的变化而实现的。社会资本理论及公平过程理论为理解社会信任感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内在机制提供了理论基础。在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社会信任感被视作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其中社会资本被定义为社会网络中内嵌的信息、知识、信任及规范,这些资本能为个体或群体带来多样性收益。社会信任感可以有效促成社会关系的建立与维系,提供社会支援,降低交易成本,增进合作精神,从而通过提升社会资本来增强主观幸福感。公平过程理论强调了社会公平感对个人主观幸福感的显著影响,无论是对结果的公平感还是对过程的公平感,都对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产生了深远影响。当社会公平的感知增强时,社会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相应提升。随着社会信任感的增强,社会资本得到提升,个体对社会公平的感知增强,因而主观幸福感也在增强。

2. 有时使用互联网

有时使用互联网群体的分析结果见表 10。

从表 10 可知,中介效应分析共涉及三个模型,分别如下:

$$A36 = 2.798 - 0.012 * \text{Provinces} + 0.147 * \text{Gender} - 0.029 * \text{Min} + 0.015 * \text{Religion} + 0.033 * \text{Educ} + 0.228 * A33$$

$$A35 = 1.870 - 0.003 * \text{Provinces} - 0.076 * \text{Gender} + 0.036 * \text{Min} + 0.005 * \text{Religion} + 0.043 * \text{Educ} + 0.383 * A33$$

$$A36 = 2.377 - 0.011 * \text{Provinces} + 0.164 * \text{Gender} - 0.037 * \text{Min} + 0.014 * \text{Religion} + 0.024 * \text{Educ} + 0.142 * A33 + 0.225 * A35$$

自变量 A33(社会信任感)对 A35(社会公平感)的显著正向影响($B = 0.383$,

表 10		中介作用分析结果												N=416		
		A36					A35					A36				
		B	标准误	t	p	β	B	标准误	t	p	β	B	标准误	t	p	β
常数		2.798**	0.246	11.392	0.000	—	1.870**	0.288	6.484	0.000	—	2.377**	0.249	9.544	0.000	—
Provinces		-0.012	0.007	-1.597	0.111	-0.077	-0.003	0.009	-0.400	0.689	-0.019	-0.011	0.007	-1.544	0.123	-0.072
Gender		0.147	0.081	1.807	0.072	0.086	-0.076	0.095	-0.794	0.428	-0.036	0.164*	0.078	2.086	0.038	0.096
Min		-0.029	0.032	-0.881	0.379	-0.042	0.036	0.038	0.937	0.350	0.043	-0.037	0.031	-1.167	0.244	-0.054
Religion		0.015	0.011	1.438	0.151	0.069	0.005	0.013	0.411	0.681	0.019	0.014	0.010	1.377	0.169	0.063
Educ		0.033	0.019	1.753	0.080	0.084	0.043	0.022	1.915	0.056	0.088	0.024	0.019	1.286	0.199	0.060
A33		0.228**	0.038	5.919	0.000	0.280	0.383**	0.045	8.475	0.000	0.386	0.142**	0.040	3.515	0.000	0.174
A35												0.225**	0.041	5.533	0.000	0.274
R ²		0.106					0.171					0.168				
调整 R ²		0.092					0.159					0.154				
F 值		F(6409) = 8.047, <i>p</i> = 0.000					F(6409) = 14.040, <i>p</i> = 0.000					F(7408) = 11.771, <i>p</i> = 0.000				

$p<0.01$)表明(表 10),当个体在社会中感受到更高的信任水平时,倾向于认为社会更加公平。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信任感作为一种资源,有助于缓解潜在的不公平现象,从而提高个体对社会公平的感知。自变量 A33(社会信任感)对 A36(主观幸福感)的显著正向影响($B=0.142, p<0.01$)表明(表 10),社会信任感对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有积极作用。普特南的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他强调社会信任感在形成社会凝聚力和主观幸福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信任感使人们能够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从而提高个体的幸福感。中介变量 A35(社会公平感)对 A36(主观幸福感)的显著正向影响($B=0.225, p<0.01$)表明(表 11),社会公平感对个体的幸福感起到关键作用。这与罗尔斯(J. Rawls)的正义观相符,他认为公平是社会正义的核心原则,公平的社会环境对于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形成至关重要(Rawls, 1971)。当个体感受到社会公平时,他们更容易认为自己在社会中受到尊重和公平对待,从而提高幸福感。在控制变量方面,性别(Gender)对 A36(主观幸福感)的显著正向影响($B=0.164, p<0.05$)表明,不同性别在幸福感方面存在差异。

表 11 中介作用检验结果汇总										
项	c	a	b	a * b	a * b	a * b	a * b	a * b	c'	检验结论
	总效应			中介效应值	Boot SE	z 值	p 值	95% Boot CI	直接效应	
A33→A35→A36	0.228**	0.383**	0.225**	0.086	0.026	3.274	0.001	0.058—0.160	0.142**	部分中介

表 12 中介作用效应量结果汇总						
项	检验结论	c	a * b	c'	效应占比计算公式	效应占比
		总效应	中介效应	直接效应		
A33→A35→A36	部分中介	0.228	0.086	0.142	$a * b/c$	37.831

表 13 效应值 95%置信区间					
项	c	a	b	a * b	c'
	总效应			中介效应	直接效应
A33→A35→A36	0.152—0.303	0.294—0.471	0.145—0.305	0.058—0.160	0.063—0.220

注:a * b 为 95% bootstrap CI。下同。

在有时使用互联网的情境下,分析结果显示,A33(社会信任感)通过 A35(社会公平感)对 A36(主观幸福感)产生部分中介作用(表 12、表 13)。这些研究结果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有时使用互联网的情境下,社会信任感会影响主观幸福感。首先,当个体对周围环境的信任感较高时,他们更容易认为社会是公平的。这种信任感可能来自他们在互联网上与他人的互动,这些互动可能增强了他们对社会的信任。其次,社会公平感被认为是个体主观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Kawachi, Kennedy & Lochner et al., 1997)。当个体认为社会公平时,他们可能更容易满足于自己的需求和目标,从而提高幸福感。综上所述,在有时使用互联网的情境下,社会信任感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内在机制,是通过引起社会公平感的变化达成的。这表明在这种情境下,提高社会信任感、社会公平感有助于提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

3. 频繁使用互联网

频繁使用互联网群体的分析结果见表 14。

从表 14 可知,中介效应分析共涉及三个模型,分别如下:

$$A36 = 3.230 + 0.050 * Gender + 0.007 * Min - 0.000 * Religion + 0.019 * Educ - 0.000 * Provinces + 0.163 * A33$$

$$A35 = 2.165 - 0.031 * Gender + 0.008 * Min + 0.015 * Religion + 0.016 * Educ + 0.004 * Provinces + 0.304 * A33$$

$$A36 = 2.795 + 0.057 * Gender + 0.006 * Min - 0.003 * Religion + 0.016 * Educ - 0.001 * Provinces + 0.102 * A33 + 0.201 * A35$$

自变量 A33(社会信任感)对 A35(社会公平感)的显著正向影响($B = 0.304, p < 0.01$)表明(表 14),对于频繁使用互联网的人来说,当社会信任感增加时,他们对社会公平感的评价也会提高。这再次验证了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理论,即社会信任感与社会公平感之间的积极联系。自变量 A33(社会信任感)对 A36(主观幸福感)的显著正向影响($B = 0.102, p < 0.01$)表明(表 14),在频繁使用互联网的群体中,社会信任感对于个体幸福感的形成同样具有积极作用。这与普特南的观点相吻合,他强调社会信任感对于社会凝聚力和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性。中介变量 A35(社会公平感)对 A36(主观幸福感)的显著正向影响($B = 0.201, p < 0.01$)(表 15)证实,在频繁使用互联网的群体中,社会公平感对主观

表 14		中介作用分析结果												N=2016		
		A36					A35					A36				
		B	标准误差	t	p	β	B	标准误差	t	p	β	B	标准误差	t	p	β
常数		3.230 **	0.098	32.826	0.000	—	2.165 **	0.119	18.220	0.000	—	2.795 **	0.103	27.119	0.000	—
Gender		0.050	0.033	1.544	0.123	0.034	-0.031	0.039	-0.791	0.429	-0.017	0.057	0.032	1.788	0.074	0.038
Min		0.007	0.014	0.514	0.607	0.011	0.008	0.017	0.462	0.644	0.010	0.006	0.014	0.414	0.679	0.009
Religion		-0.000	0.006	-0.041	0.967	-0.001	0.015 *	0.007	2.114	0.035	0.045	-0.003	0.006	-0.570	0.569	-0.012
Educ		0.019 **	0.005	3.988	0.000	0.088	0.016 **	0.006	2.710	0.007	0.058	0.016 **	0.005	3.426	0.001	0.073
Provinces		-0.000	0.003	-0.087	0.931	-0.002	0.004	0.004	1.000	0.318	0.021	-0.001	0.003	-0.339	0.735	-0.007
A33		0.163 **	0.017	9.740	0.000	0.212	0.304 **	0.020	15.059	0.000	0.319	0.102 **	0.017	5.947	0.000	0.133
A35												0.201 **	0.018	11.201	0.000	0.250
R ²		0.054					0.107					0.110				
调整 R ²		0.052					0.105					0.107				
F 值		F(62 009) = 19.276, <i>p</i> = 0.000					F(62 009) = 40.288, <i>p</i> = 0.000					F(72 008) = 35.468, <i>p</i> = 0.000				

幸福感的形成具有关键作用。这与罗尔斯的正义观一致,即公平是社会正义的基础,公平的社会环境有助于提高个体主观幸福感。对于控制变量,受教育程度(Educ)对 A36(主观幸福感)和 A35(社会公平感)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分别为 $B=0.016$, $p<0.01$; $B=0.019$, $p<0.01$)。这表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个体往往对社会公平感、主观幸福感有更高的评价。

表 15 中介作用检验结果汇总										
项	c	a	b	a * b	a * b	a * b	a * b	a * b	c'	检验结论
	总效应			中介效应值	Boot SE	z 值	p 值	95% Boot CI	直接效应	
A33→A35→A36	0.163**	0.304**	0.201**	0.061	0.010	6.342	0.000	0.061—0.099	0.102**	部分中介

表 16 中介作用效应量结果汇总						
项	检验结论	c	a * b	c'	效应占比计算公式	效应占比
		总效应	中介效应	直接效应		
A33→A35→A36	部分中介	0.163	0.061	0.102	a * b/c	37.492

表 17 效应值 95%置信区间					
项	c	a	b	a * b	c'
	总效应			中介效应	直接效应
A33→A35→A36	0.130—0.196	0.264—0.344	0.166—0.236	0.061—0.099	0.068—0.135

表 15、表 16 总结了中介作用的检验结果。A33 通过 A35(互联网使用满意度)对 A36(主观幸福感)产生部分中介作用。表 15 显示,A33→A35 的路径系数(a)是 0.304($p<0.01$),A35→A36 的路径系数(b)是 0.201($p<0.01$),A33 直接影响 A36 的路径系数(c')是 0.102($p<0.01$),中介效应值(a * b)是 0.061。通过自助法检验,中介效应的 95%置信区间为 0.061—0.099,说明中介效应是显著的。表 16 显示,A33 通过 A35 对 A36 产生的部分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37.492%。表 17 提供了效应值的 95%置信区间,A33 对 A36 的总效应值的置信区间为 0.130—0.196,A33 对 A35 的总效应值的置信区间为 0.264—0.344,A35 对 A36 的总效应值的置信区间为 0.166—0.236,中介效应值的置信

区间为 0.061—0.099, A33 直接影响 A36 的总效应值的置信区间为 0.068—0.135。

总之,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在三种互联网使用程度的群体中,社会信任感对社会公平感、主观幸福感均有显著影响,社会公平感对主观幸福感也有显著影响。这表明,无论互联网使用程度如何,社会信任感、社会公平感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均存在显著关系。然而,在从不使用互联网的群体中,社会信任感对社会公平感的解释力(R^2)为 0.109;在有时使用互联网的群体中,该值为 0.171;在频繁使用互联网的群体中,该值为 0.107。这表明,在有时使用互联网的群体中,社会信任感对社会公平感的解释力较强。此外,在从不使用互联网的群体中,社会信任感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程度(β)为 0.282;在有时使用互联网的群体中,该值为 0.383;在频繁使用互联网的群体中,该值为 0.304。这说明,在有时使用互联网的群体中,社会信任感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程度最高,H4 不成立。这可能是因为有时使用互联网的群体在获取信息、建立社交关系和评估社会环境方面拥有更多的选择和资源(Castells, 2000)。互联网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来源,使他们能够综合分析社会信任感和社会公平感,并将这两个因素与个体主观幸福感相联系(Diener, Oishi & Lucas, 2003)。

第二,在三种互联网使用程度的群体中,社会信任感对主观幸福感均有显著影响。在从不使用互联网的群体中,社会信任感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β)为 0.155;在有时使用互联网的群体中,该值为 0.142;在频繁使用互联网的群体中,该值为 0.102。这说明,在从不使用互联网的群体中,社会信任感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最高,H5 不成立。对于从不使用互联网的群体,其社交范围主要在物理社区内,更多依赖于面对面的交往,使社会信任感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为显著。公平过程理论指出,个体对于环境公正的感受程度决定了其社会满意度,进而影响其主观幸福感。未接触互联网的群体通过直接的社会交往来判断公平性,因此社会信任感在他们的主观幸福感中占据了更大的比重。

第三,在三种互联网使用程度的群体中,社会公平感对主观幸福感均有显著影响。在从不使用互联网的群体中,社会公平感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β)为 0.282;在有时使用互联网的群体中,该值为 0.383;在频繁使用互联网的群体

中,该值为0.304。这说明,在有时使用互联网的群体中,社会公平感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最强。该现象可能源于该群体在信息获取、社会公平性判断及网络信息甄别等方面的优势。该群体可以通过互联网接触更多信息,同时仍能通过现实社交获取具有针对性的信息,从而形成全面而深入的社会公平性理解。与频繁使用互联网的群体相比,他们较少受到网络负面信息的冲击;与未接触互联网的群体相比,他们对社会公平性有更准确的判断。因此,社会公平感在此类群体中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尤为显著。

第四,互联网使用程度的提高,降低了公众社会信任感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以及社会信任感、社会公平感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即使个人对社会的信任感相对较高,他们也可能因为接触一些揭示社会不公的信息而对社会公平性产生质疑。这就可能解释为什么随着互联网使用程度的提高,社会信任感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减弱。

这些差异揭示了互联网使用程度可能会影响个体对社会信任感、社会公平感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认知。不同程度的互联网使用可能会导致个体在信息获取、社交互动等方面的差异,进而影响他们对社会信任感、社会公平感与主观幸福感的关联程度的评估。

公众主观幸福感对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的稳定性和发展的可持续性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本文研究基于上述实证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政府部门应对公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有所关注并采取一些行动。首先要通过增加民生财政支出,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满足公众多样化的公共服务需求,逐步增强公众对社会发展和幸福生活的信心;其次要提高群体教育水平,利用教育过程中产生的安全感与获得感对社会信任提供正向影响;最后要密切关注群体社会关系,通过发展社会中介组织,正确发扬群体效应,增强公众的人际信任和发展信心,确保社会信任感在提升个体主观幸福感中发挥更大作用。

第二,针对不同的互联网使用程度群体,政府应实施提升主观幸福感的差异化策略。首先,对频繁使用互联网的群体,政府部门应采取教育、正面引导等手段来提高这部分群体的信息甄别意识和理性判断能力,进而削弱误导性、欺骗性网络信息对社会信任和社会公平的危害。其次,对从不使用互联网的群体,政府应通过提高大众教育水平、宣传互联网媒介传播效应等方式,使该群体学会利用

互联网中的海量有利信息应对现实生活中的不确定性风险,提升自身的主观幸福感。最后,针对有时使用互联网的群体,政府需要采取均衡发展策略来提高这部分群体的主观幸福感,如:推广并强化数字素养教育;建立和完善信息公开平台,以便该群体更便捷地获取公正、准确的社会信息;注意维护和保护该群体的线下社区生活;鼓励并协助该群体在互联网上发挥更大的价值。

第三,针对女性社会公平感相对较低的现象,应注意以下方面:一是积极地从根本上打破性别刻板印象;二是加强对女性经济权益的保护;三是增加女性在社会决策中的占比和影响力;四是加强网络环境的建设和监管,保护女性免受网络骚扰。

五、结论

本文通过对不同互联网使用程度群体的对比分析,对主观幸福感、社会公平感、社会信任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结论:一是互联网使用程度并未对主观幸福感产生直接影响,否定了互联网信息抑郁论和互联网信息动员论;二是受教育程度对主观幸福感呈现显著正向效应;三是随着互联网使用程度的提高,公众对社会公平感的感知降低;四是不同地区的公众对社会公平感的感知存在显著差异,表明社会公平感受地域影响;五是性别差异影响对社会公平性的感知,女性对社会公平性的感知相对较低。进一步的分析揭示了社会信任感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内在机制,即通过引发公众对社会公平感的变化而达成。特别是,在有时使用互联网的群体中,社会信任感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最强,社会公平感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最强;而在从不使用互联网的群体中,社会信任感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最强。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首次从互联网使用程度的角度,系统地探讨其与社会信任感、社会公平感以及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既丰富了互联网使用对社会影响的研究成果,又为理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结合社会资本理论与公平过程理论,揭示了社会信任感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内在机制,这种理论整合提供了一个更全面的框架来理解社会信任感、社会公平感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复杂关系。总之,本文关注互联网使用程度对社会信任感、社会公平感

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影响,并通过对比不同互联网使用程度群体的数据,揭示互联网使用对于不同群体感知这些变量的影响,以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有益参考。

参考文献

- 丁雨桥,2022,《互联网使用对中老年人生活幸福感的影响》,南京邮电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郭锦墉、王文锋、汤永红,2023,《消费不平等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农林经济管理学报》第3期。
- 井世洁、杨宜音,2013,《转型期社会信任感的阶层与区域特征》,《社会科学》第6期。
- 罗必良、洪炜杰、耿鹏鹏等,2021,《赋权、强能、包容:在相对贫困治理中增进农民幸福感》,《管理世界》第10期。
- 彭代彦、闫静,2014,《社会信任感与生活满意度——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WVS)中国部分数据的实证分析》,《当代经济研究》第6期。
- Alesina, A., R. Di Tella & R. MacCulloch 2004, "Inequality and Happiness: Are Europeans and Americans Different?"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8(9-10).
- Bjørnskov, C. 2008, "Social Trust and Fractionalization: A Possible Reinterpretation."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4(3).
- Bjørnskov, C., A. Dreher & J. Fischer 2007, "The Bigger the Better? Evidence of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Size on Life Satisfaction Around the World." *Public Choice* 130.
- Blanchflower, D. & A. Oswald 2004, "Well-Being over Time in Britain and the USA." *Public Economic* 88(7-8).
- Brockner, J., Y. Chen & E. Mannix et al. 2003, "Culture and Procedural Fairness: When the Effects of What You Do Depend on How You Do It."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5(1).
- Cantril, H. 1965, *The Pattern of Human Concerns*,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Castells, M. 2000,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 Cohen, S. & T. Wills 1985, "Stress, Social Support, and the Buffering Hypothe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98(2).
- Diener, E., E. Suh & R. Lucas et al. 1999, "Subjective Well-Being: Three Decades of Progres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5(2).
- Diener, E., R. Emmons & R. Larsen et al. 1985,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49(1).

- Diener, E. , S. Oishi & R. Lucas 2003, “Personality, Cultur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Emotional and Cognitive Evaluations of Life.”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4.
- Dolan, P. , T. Peasgood & M. White 2008, “Do We Really Know What Makes Us Happy? A Review of the Economic Literature on th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Subjective Well-Being.”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29(1).
- Easterlin, R. 1974,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in P. David & M. Reder eds. ,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Amsterdam: Academic Press.
- Gurr, T. 1970, *Why Men Rebe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elliwell, J. & R. Putnam 2004, “The Social Context of Well-Being.”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15347534>.
- Helliwell, J. & S. Wang 2011, “Trust and Wellbeing.” <https://www.nber.org/papers/w15911>.
- Hudson, J. 2006, “Institutional Trus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cross the EU.” <https://doi.org/10.1111/j.1467-6435.2006.00319.x>.
- Inglehart, R. 1997,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awachi, I. , B. Kennedy & K. Lochner et al. 1997, “Social Capital, Income Inequality, and Morta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87(9).
- Lyubomirsky, S. , L. King & E. Diener 2005, “The Benefits of Frequent Positive Affect: Does Happiness Lead to Succes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1(6).
- Naef, M. & J. Schupp 2009, “Measuring Trust: Experiments and Surveys in Contrast and Combination.” <https://www.iza.org/publications/dp/4087/measuring-trust-experiments-and-surveys-in-contrast-and-combination>.
- Oreopoulos, P. & K. Salvanes 2011, “Priceless: The Nonpecuniary Benefits of Schooling.”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5(1).
- Putnam, R.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Rawls, J. 1971,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Robinson, M. 1976, “Public Affairs Television and the Growth of Political Malaise: the Case of the Selling of the Pentag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0(2).

- Rothstein, B. & D. Stolle 2008, "The State and Social Capital: An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Generalized Trust." *Comparative Politics* 40(4).
- Ryff, C. 1989,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or Is It? Explorations on the Meaning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7(6).
- Sønderskov, K. 2011, "Does Generalized Social Trust Lead to Associational Membership? Unravelling A Bowl of Well-Tossed Spaghetti."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7(4).
- Uslaner, E. 2002, *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Tru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ilkinson, R. & K. Pickett 2009, "Income Inequality and Social Dysfunct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5.